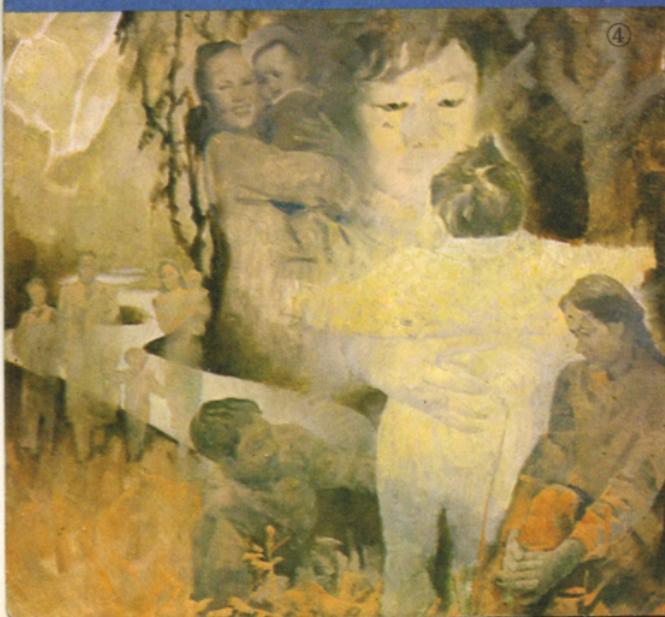




张洪年的画



我的脉搏 和祖国母亲的心一起跳动

张洪年

我是一个艺术上刚刚起步的青年。我从小爱好美术，但并不是生活在一个艺术家的家庭里。有的同学听说我的父亲在美国的大学里讲授东方文学，而妈妈又是一位语文教员，就认为其中有着因果关系。其实，除了希望我成为好孩子外，他们根本顾不得设计我。在恬静的童年生活中，象很多孩子一样，我以瞎涂乱抹开始画画。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张“画”是偶然地画出一个象斧头一样的东西。于是我重复了几次，开始有了“创作”的信心。可以说这就是我艺术生涯的开端。从此，画画成了我生活的伙伴，幻想的翅膀成了我小小的天地与外面广大世界之间的桥梁。从黄继光、杨根思到惊涛骇

浪中的多桅帆船，凡是能进入我小脑瓜中的一切，我都愿把他（它）们再现在纸上。

当我到了上学的年令，虽然更喜欢画画了，但又以同等的热情对待学习和少先队的工作。同时，我还是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小歌手、集邮迷、诗朗诵的爱好者……至今，我不认为这些事分散了我的精力；相反，它们充实着我，特别是星星火炬，我终生不会熄灭它在我心中拨亮的理想之火。直到最近，我准备画的一组画中还有一幅题叫《听，那连天的队鼓声》！正是这庄严的鼓声和那一片片高举过头顶的小手，总使我不丧失信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它使我不改初衷地认为，自己的一切艺术实践都是为这世界更美好而奋斗的。更不用说那些至今在我心中盘旋的童声大合唱，当我陶醉在一个由歌声交织成的绚丽的空气中时，就已经产生了创造美的冲动。当对着台下的小朋友，朗诵一首催人泪下的诗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很多年后，我在作画时也感到这种类似的激情。至于邮票作为微型美术作品，它吸引了我多少凝思和遐想啊！记得我曾鼓着勇气陪一位同学穿过一条黑胡同，因为他答应为此送我一套纪念画家列宾的邮票……总之，在我童年、少年时代，虽然在有据可查的学期评语中，老师都写下了“爱好美术”、“擅长图画”等等美言，而我确实只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一个兴趣非常广泛的儿童。始终没有间断的画画，只不过是我自在的表达方式——一个孩子对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的无穷兴趣。

直到我的姐姐——少先之家舞蹈组的成员，把我带到那里的美术组，看到许多中学的哥哥姐

姐们在画石膏和静物，才知道有一种学问，叫美术；有一个地方，让你觉得似乎进入了艺术的宫殿，我从此就不曾离开它了。我虽不能称为千里驹，但却知道在我们社会里有很多伯乐。从那第一个把我收到美术组、把一个小石膏放到我面前的杨辅导员，到偶然在景山看到我画的风景就说“明天你来少年宫美术组活动”的乔辅导员；从当时刚刚毕业于艺术学院、手把手地教我们，直到把我们送进美术学校的张辅导员；一直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群星灿烂的年青艺术家们——虽然他们有的退休了，有的改行了，有的也开始进入老年，而我每当见到他们，都在心里向他们深深鞠躬，叫他们“老师”！是他们，还在我不到十二岁就开始以正规的训练，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是他们教我脱离自在的绘画阶段而研究观察方法和造型及色彩的规律；是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不断点起向未知世界前进的路灯。直到现在，当我们“翅膀硬了”也要去探索新的道路时，当我们要摆脱规范化的方法，甚至在一个高级的阶段追寻某种孩提时代的自在状态时，我不会忘记是他们把我带到这个阶段的。

虽然在所有这些学习阶段，我受到了良好的基本功训练，但我始终象以前一样醉心于创作，以至我现在还在问自己，是否我就是这样忽略了技巧独立的美？还是由于对生活过于敏感而难以忘情；或者天性中就渴望与他人交流？城市人民公社的缝衣组，三年困难时长安街上昂首前进的煤气车，夏日中挥汗如雨的售票员，冬天凛冽寒风中的送煤工人，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陈铁军、周文雍刑场上的婚礼，凡是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平凡而又

可敬的人们，直至文艺、历史上对一个少年人有吸引力的一切，我都有兴趣收进我的画幅中。坦白地讲，有时我真觉得比石膏像有趣得多。尽管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能再到学院去补习基本训练，但那种无意中把绘画看作感情的流露并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出发点，也许是对的。

但在那个文化禁锢的时期，我们不仅被剪去了翅膀，而且也几乎忘记了飞翔。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我感到自己的艺术天地仿佛受到原子弹的轰击，久久不能长出花草来。

但我并没有丧失对前途的信心。我觉得在祖国母亲的身上，蕴藏着无穷的力量。记得童年时，我随母亲去外地看望舅舅。我曾整天整夜地伏在火车车窗旁，望着我们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广袤的土地，正经历奇迹般变化，蒸蒸日上，百废俱兴。贫穷而又端庄秀丽的祖国母亲啊，我视线所触，无不遇到她慈爱的目光。她始终温暖着我的心。在以后的年月里，我常常低吟：“梦中依稀慈母声，伴我恬睡童年行，难忘摇篮寄深情，怎知路断绝音尘……”这一次，又是在扫除了妖孽的祖国大地上，我重新得到失去的信息。1968年我在黄河边上写道：“……我

为走近她而感到激动，就象久别了亲娘的孩子，被带到母亲身边那样感到一种莫明的辛酸……因为能够看清自己血亲的渊源、实实在在的祖先形象而感到身心都融化了……”在我心灵的废墟上，我又找回了自己埋藏在那里的最纯真的灵魂：“原野你等待我，我正走向你绿色的胸怀，仍象一个孩儿，来吮吸你原始的母乳。”在文艺的春天里，我心中的坚冰开始融化了。我既想痛痛快快地哭，更想放声高唱！而最主要的是再不能丢失感情中最珍贵的东西——真。我感到又可以和一切人们真挚地谈话了。我画了《呵，黄河》、《那时我们正年青》、《送别》、《发人深思》、《在命运的列车上》、《山村吟》等油画。当它们受到群众的好评和在许多同代人心中引起强烈共鸣时，我真是感动极了——人们的心总是相通的。

我寻求共鸣，可能是因为十年动乱，人们曾被分裂，心之间加深了隔阂。而我却更相信在人的心底里，有共同的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我希望在人们最细小的心弦上引起共鸣，在构思和作画的时候，正象与朋友交谈，要推心置腹，毫无保留，不惜献出那种只属于自己经历的、一旦讲出就会变得黯然的那些珍贵东西。

为使这种表达更自然，我试图以感情在视觉和思维过程中的一些原始的形式再现到画面上。不是以逻辑的力量，而是以生活的直感；不是以思维的终结，而是以它流动中的状态，多瞬间和多空间地与观众共同去体验、去经历一种感情和思想的过程。这在《发人深思》、《命运的列车》、《思源》等作品中尤为明显。这大概也是“思考的一代”在某一个阶段的精神状态吧！因此，在最近的《山村吟》中，它们的方式又有所改变，感情更内在了，爱更深沉了。我追求中国诗词那种精练而又韵味无穷的传统。时空变幻而又浑然一体，形象各异而又相映成辉，有比、兴，有情、景，似无意之中而有安排，给观众充分的联想和思索的余地。

今后是否这样画下去，还不能肯定，形式上总是要变的（比如正在画的《土地》组画就是以河北剪纸的色彩表现的）。但这完全不是为了形式而变，是为了感情更充分地表达。我只是考虑它是否发自内心深处，是否能在群众中获得共鸣，而且有一点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就是我的创作的脉搏总是和祖国母亲，和人民的心一起跳动的。

识？只不过当初你们的球打得没这么好，现在打得可真棒！”大家都笑了。

如今，在大街上，在商店里，人们遇到祝新运，还会惊喜地指点着他，可他已不仅仅是昔日的“小冬子”了，他成长了，成熟了。正如他自己说的：“回顾小时

候，真是非常幼稚，也许再长大了，回想现在还是幼稚。可我总算认定了一个目标，要做一个人民的好演员，为我们的兵服务，为群众服务。我珍惜自己的青春，决不让宝贵的年华白白逝去！”

（上接第41页）
他们很快就熟悉了。去年，女排夺得世界杯金牌后，电影界和体育界举行联欢会，会上，女排的老队员孙晋芳、曹慧英、杨希、毛毛（张蓉芳）等见到了小祝围着她问：“你还认识我们吗？”小祝调皮地回答：怎么不认